

第一章

绪论

策应国家需求，构建适应“一带一路”建设的外语规划，是当前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议题。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外语的地位规划、语种规划、功能规划和习得规划工作举足轻重。过去的一些研究虽然注意到了外语规划对于国家非传统领域安全的重要性，主要从理论上阐述了具有较高外语水平人才的缺乏将给部分行业领域造成很大的损失，但相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而言还比较零散，实证研究严重缺乏。本研究采用实证研究与文献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对面向“一带一路”建设的外语规划构建进行专门研究，为国家发展服务。

本章首先界定“一带一路”和“外语规划”，简要介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然后交待研究背景，分析现有关于“一带一路”研究的不足，特别是语言规划研究方面的特点和不足，最后指出研究目的和全书的框架结构。

1.1 相关概念

1.1.1 “一带一路”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时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号召，随后在出访东南亚国家期间又提出共同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年11月，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中国应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互联互通,以此推动“一带一路”发展,努力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开放的新格局。2014年11月,中央召开了第八次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专门研究“一带一路”规划,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专门设立丝路基金。2015年3月,我国政府正式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内容包括“一带一路”的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

根据《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称,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1.1.2 外语规划

外语规划是语言规划的一个方面,在国家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科技、教育、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鲁子问是国内最早对外语规划进行研究的学者。他认为“外语规划是政府或社会团体有目的、有组织地对外语生活进行干预与管理的公共政策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解决语言生活中在外语方面出现的问题,从而使外语更好地为社会服务”(鲁子问,2005:499)。赵蓉晖(2014)将外语规划定义为政府或社会组织机构对外国语言文字的形式和功能进行的有组织、有目的的调整的社会工作。

这里的“政府”特指各级负责制定和实施语言规划的政府机关。这里的“社会团体”可理解为介于此类政府机关和个体之间的人们工作、学习和社交的场所所隶属的单位或组织机构,如企业、学校、街道、社区等。

但是,各级负责制定和实施语言规划的政府机关以外的其他任何有外语生活且对自身外语生活进行干预与管理的各级政府机关,他们和企业、学校、街道、社区一样,在进行内部外语规划时接受各级负责制定和实施语言规划的政府机关的规定和指导。

根据微观语言规划观,外语规划还应当包含个体对自己和所在家庭的外语生活进行干预和管理的行为。

在对外语规划进行分类时，可以把语言规划的分类标准作为依据。

就语言规划而言，Kloss (1969) 首次明确提出了语言的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关注语言本身，主要包括：(1) 文字化，从口头语转变为书面语；(2) 标准化，规范语言；(3) 现代化，使语言与时代发展同步。地位规划则超越了语言本身，关注语言的外部社会环境，包括语言的选择和传播活动等。本体规划常由地位规划引出。

戴庆厦、陈章太在语言规划的分类上也遵循 Kloss 的分类方法，并给出了更为详尽的定义：“语言地位规划指配合政府制定语言政策，选择确定标准语、共同语或官方语言，创造、改革文字，协调语言关系，保障公民的语言权利；语言本体规划则指全民共同语与民族标准语的推广与规范、文字规范标准的制定与推行、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新词语的整理与规范”（见郭龙生，2007：70）。

胡壮麟（1998）将语言规划分为地位规划、材料规划和元规划三类。其中：地位规划是从政治角度考虑，是对不同交际场所不同语言具有的地位进行规划；材料规划是指对交际语言中所使用的词汇、语法、内容等材料进行改造与加工；元规划是研究语言规划的目的、原则、方法和策略。

郭龙生（2007）在对中国当代语言规划分类时，除了列出语言地位规划与本体规划之外，还列出了语言传播规划，目的是为了将我国国家通用语的影响力扩大到国际范畴。李宇明（2008）提出了基于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上的语言功能规划。

赵蓉晖（2014）认为中国的外语规划应涵盖地位、习得、翻译及功能规划四个方面。康建刚（2010）对中国的外语规划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分类，在外语教育规划和语种规划的基础上，还提出了外语身份认同规划、外语人口规划、外语资源规划以及外语能力规划。

综合前人提出的语言规划分类方法，同时参考“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学界对语言生活、语言服务和语言管理的讨论，我们将外语规划分为外语地位规划、外语语种规划、外语功能规划和外语习得规划四类。

1.1.3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语言

“一带一路” 沿线语言资源丰富，国内学者对沿线官方语言的统计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据李宇明（2015）统计，沿线国家的官方语言有近 50 种，民族和部族语言更是不下 200 种。

1.2 研究背景

1.2.1 “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和内容

根据《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是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源，加强各国的互联互通关系，共建全方位、多层次和复合型的结构体系，努力实现沿线各个国家之间多元化、自主化的平衡可持续发展。其内容主要包括五大方面，分别是政策互通、贸易畅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

政策互通指在国家具体方针政策方面，沿线国家共同商讨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促进各国经济发展。贸易畅通指各国积极参与推动经济合作的便利化和自由化，降低贸易壁垒。设施联通强调道路畅通，逐步建立亚洲和欧洲的运输通道，共建连接亚、欧、非的交通运输网。资金融通则是要加强货币流通，增加流通量，逐步推动本币兑换和结算，提高国家对金融风险的抵抗力和国家在整个区域内的经济竞争力。民心相通则是指沿线国家人民加强交流，增加多种形式的互动，使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民更加了解彼此，增进友谊。

1.2.2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领域和行业

《愿景与行动》提出在六个领域与沿线国家展开合作，具体包括海上丝路、地面丝路、空中丝路、电力和能源丝路以及信息丝路。

海上丝路主要指港口建设。中国港口企业如中国海运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水路联运和国际间合作。此外，招商局集团作为全球最大港口运营商之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积极进行投资建设。海上丝路的建设不仅让中国港口走出去，拥有了更多的机遇寻求发展，而且也让“一带一路”区域国家拥有了更多的可发展机遇。

地面丝路主要指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铁路、桥梁等。其中多数都由中交集团和中国中铁承建。著名的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不仅包括公路、铁路的铺设，还包括能源通道的建设。东非铁路、中码友谊大桥等“桥头堡”建设项目陆续展开。地面丝路的“硬联通”促进了沿线国家人民之间的“软联通”。

空中丝路主要指空中航线建设。中国航空建设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展开，充分利用国内各个区域优势，为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提供航空便利，在空中架起合作